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

FROM TRIBE TO STATE :
AN EARLY HISTORY OF THE MANCHUS

— 刘小萌 /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

FROM TRIBE TO STATE :
AN EARLY HISTORY OF THE MANCHUS

刘小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刘小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5004-5973-6

I. 满… II. 刘… III. 满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K28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2589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李天勇
责任校对 刘俊
封面设计 孙元明
技术编辑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2 版

印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980 1/16

印张 23.75

插页 1

字数 392 千字

定价 4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为迎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将历届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中的部分获奖著作重印出版，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首批图书向建院三十周年献礼。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滿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

姜夔题



序

王鍾翰

刘君小萌撰著的《满族的部落与国家》一书，致力于对清入关前满族先世女真人的历史研究，大量搜集满、汉文文献档案资料，尽可能地吸收国内外一切有关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实际出发，进行综合分析和概括，不囿成说，卓有创见，不失为目前满族开国史研究中最集中、有系统而又全面深入，具有较高水平的一部学术专著。全书约 29 万字，现由清史专家李治亭教授推介，交吉林文史出版社慨然准予出版，即将公诸于世。顷刘君以原稿全部相示，并嘱序之。以有师生谊，我何敢辞？

刘君小萌，河北完县人。80 年代初，从河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入我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满族史硕士研究生，问学于我。刘君熟练掌握俄文与满文，兼通日文。勤于学，敏于思，每有所疑，辄不耻下问。三载朝夕相处，质疑问难为多，我则深感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之为乐事也。80 年代中，刘君以优异成绩卒业前夕，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编纂组需一兼通满文的清史研究人员，遂推荐刘君，刘君欣然往。先为著名蒙元史专家蔡美彪教授助手有年，继而考取蔡教授的在职博士研究生，三年学习期间，蔡教授亲为讲授各课。私庆刘君能得侍蔡教授讲席，学业猛进，名师出高徒，蔡教授不患传之无其人矣。

多年来刘君与我城郊分处，而刘君不以交通为阻，时相过从，偶亦出示所作，令我先睹为快，即或妄加点窜，不特不我见怪，颇引为知赏而持去。80 年代末，刘君行将博士生毕业，蔡教授原约我参加毕业论文答辩会，适我有远行，未克如命以往。但刘君长达十二三万字的《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毕业论文打印稿，仍以一份相贻。粗略翻阅过，益足征在蔡教授精心指导下撰成的毕业论文，洵是一篇出色的不可多得的博士论文。今兹《满族的部落与国家》一书即在上述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穷

二三年之力，修改增订而成，字增一倍以上。两相比较，尤可见蔡教授循循善诱，严格要求，奖掖后进，敦促有方；刘君用力之勤奋，思考之周密，访罗之丰富，取舍之精审，与蔡师相得益彰。刘君能取得这一新研究成果，不可谓非难能可贵的后起之秀了。

刘君这一新研究成果，其最大优点在于：本书的研究对象不局限于以满族本身史料来论证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也不局限于清朝奠基人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的50年间的历史进程。这是因为：一则从时间上追本溯源，从13世纪上半元末明初之际开始，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半努尔哈赤的继承者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崇德年间，前后历时300余年之久；再则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察，除探讨以建州三卫和海西部为核心的满族共同体外，扩充到居住在整个东北地区，凡与满族有一定血缘关系以及和历史传统文化渊源有关的通古斯语族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各民族，甚至再推而广之，包括阿尔泰语系的突厥、回纥、蒙古、朝鲜各民族在内的相互关系，其中尤以满族共同体受蒙古族各方面的影响为多。本书中所谓“比较先进的蒙古制度，曾是努尔哈赤建国过程中学习模仿的主要对象”者即是。而且刘君进而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经济、政治、法令、婚嫁、生产诸方面，一一加以对勘，说明满族先民受比邻各先进民族，特别是受蒙古族的遗风旧俗的深刻影响，解决了不少前人所未涉及或未完全解决的疑难问题，从而将清入关前满族开国史研究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刘君好学敏求，不自满假，于书末慎重申之云：“满族的国家形成，显然属于‘受外部的影响’那一类。关于满族先民与明代以前女真人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刘君年方不惑，治学态度即谨慎如此，有足多者。是为序。

1992年2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再 版 前 言

本书1995年曾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题称《满族的部落与国家》。这次辽宁民族出版社欣然同意再版，谨遵编辑者意见，将书名改为《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拙作原是在1989年博士论文基础上写就的，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满族早期发展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至少就满族史、清朝史、东北地方史来说，只要穷源溯本，都不能不涉及这段历史，这大概就是几代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里不断耕耘、推陈出新的一个主要原因吧。笔者能够徜徉其间，苦中有乐，实在是幸运的。

笔者在研究清史和满族史过程中，始终得到诸师友的多方帮助和指教，受益良多。王锺翰师今年已88岁高龄，仍在坚持研究写作。19年前笔者慕名投入王师门下，师徒数人围坐畅谈、其乐融融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拙作所论满族国家形成问题，原是蔡美彪师指定的博士研究课题，当时感到确有一定难度，多年后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益发认识到蔡师选定此课题很有远见。通过此项研究，笔者不仅在理论和方法上受到多方训练，尤为重要的，还是为日后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理想的制高点，一个可以由前而后，循序渐进，将研究的视野不断向后延伸扩展的出发点。

定宜庄女士与笔者同入王门，近20年间屡有合作，关于拙作修订曾提出有益的建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还要向为拙作出版付出很大努力的辽宁民族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吴昕阳女士，向热情为拙作提供宝贵图片的河内良弘、顾文荃、陈林、姜相顺、李凤民、刁树仁、佟悦、王瑞琛、丁铁诸位先生，致以诚挚的感谢！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次再版，只对拙作略作修订，改正了讹脱衍误，

补充了名词索引和大事记。存在的错误和问题还会有不少，敬祈各位师长学友批评指正。

刘小萌

2001年9月19日

前 言

满族是继蒙古族以后，在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建立起统一王朝的少数民族，在清代近三百年统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研究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是满族史的重要课题。满族建立起的清朝，继承了历代王朝的大量遗产，但是又带有不同于前代的许多特征，对于这些特征，如果不联系满族的早期历史，往往难以说明。清初满族虽处在社会迅速变革的阶段，但作为一个统治民族，它的某些落后性，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又曾一度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研究满族的早期历史，对清朝制度史、政治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国内外满族史、清史学界发表了不少有关明代女真和清入关前满族历史的论文论著，但大多偏重某一专题的研究，如何从制度史的角度，对元末以迄明季三百余年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形成进行比较系统的说明，仍是一个有待努力的工作。由于满族的历史特点和资料隐讳缺略，本书研究的课题难度较大，专门性很强，笔者为从事这项工作，以较大的功力作了理论准备，并广泛利用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汉文资料和满文文献，参考了前人有关本课题的研究成果。

满族的先民女真，几乎没有留下关于自身历史的文字史料，考察这段历史主要依据当时外部明朝、朝鲜的一些记载，以及后来清朝满族统治者对其祖先业绩的追述。

朝鲜世代与女真民族为邻，历史关系悠久。与明朝同期的朝鲜，由于国力比较单薄，对东北境剽悍的女真部落不能不持有强烈戒心，比起以泱泱大国自居而目空一切的明朝来，显然更关注女真社会的动向。因此，在研究女真史和满族兴起史方面，朝鲜史料具有最重要的价值。《朝鲜李朝实录》（简称《朝鲜实录》），是朝鲜李氏王朝用汉文记载的官修史书。李朝建于1392年，止于1910年，基本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朝鲜实录》

大量记述明代女真在东北和朝鲜沿境的活动，特别是关于女真社会内部的调查和报告，在明朝官私史籍中是绝少看见的。《朝鲜实录》卷帙浩繁，全阅不易，日本学者从30年代初开始整理《朝鲜实录》，并从中摘抄女真（满）、蒙古史料，直到1954年《满蒙史料》才陆续出版，至1959年共15册全部出齐，这部史料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各种版本认真校勘，并编有人名地名索引，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吴晗辑录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全书三编，上编收明代女真史料。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和李民宥《建州闻见录》是考知满族兴起之际社会状况的两部珍藏，以往流传甚稀。1939年日本稻叶岩吉将《建州纪程图记》收入所著《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使珍本得以传布。1978年至1979年，辽宁大学历史系将两书收入《清初史料丛刊》印行。

明代汉文史料首推《明朝实录》，其中系统记录了明朝与女真诸部交往、战和的历史，有关卫所设置、贡敕制度的资料尤为翔实，但殊少对女真社会内部状况的报告，其中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因不同文化背景而导致的隔膜更摭拾可见。1940年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共500册，讹夺颇多，今以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王崇武、黄彰健等人的校勘本为佳。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从30年代初着手《明朝实录》的校勘整理，从中辑出有关满蒙史料，1954年至1959年全部出齐共18册，内《满洲篇》8册，颇便使用。

《明会典》是汇录明朝一代典章制度的书，始修于弘治年间，目前通行的是万历十五年（1587）的重修本，其中涉及女真、女真卫所制度、朝贡回赏等内容均分门别类，便于考索。《辽东志》、《全辽志》是有关明代东北的两部志书，前书为嘉靖十六年（1537）重修本，后书成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实即《辽东志》第三次修订本，所载辽东马市、陆路交通、女真诸部风俗习惯的资料弥足珍贵，金毓黻将两志收入《辽海丛书》，并进行了认真校勘。《皇明经世文编》是成于崇祯十一年（1638）的一部明人文集汇编，所收奏疏记述了不少明代女真与满族肇兴时期的史事，可补正史缺文，1962年中华书局据明刊本影印。

明末时女真族崛起于辽东，形成对明统治的巨大威胁，记载辽东或女真史事的书籍迅速增多，有官修也有私撰。谢国桢先生曾著《清开国史料考》，于有关书籍钩稽排比，介绍其作者，概括其内容，指明其优劣，乃至馆藏版本情况，读者至今称便。

谢先生指出：明人对于满族先世之记载，当以明十三朝《实录》较为准确。万斯同修《明史》，主要凭借实录。明末边事日急，朝野喜谈兵事，凡奉使边事者无不有著述。^①明季记女真（满族）史事之书按性质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记女真史事之书：马文升《抚安东夷记》、菴上愚公《东夷考略》、天都山臣《女直考》、张鼎《辽夷略》、海滨野史《建州私志》等；

记辽东形胜地理民族之书：《辽东志》、《全辽志》、冯瑗《开原图说》等；

筹辽方略之书：程开祜《筹辽硕画》、于燕芳《剿奴议撮》（附建州考）、喻德龙《秘书兵衡》、张一龙《武库纂略》、熊廷弼《按辽疏稿》等；

记辽东战事之书：鹿善继等《督师纪略》、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傅国《辽广实录》。

此外有明代著述而兼记辽东事者：何乔远《名山藏》、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陈建《皇明从信录》、沈国元《两朝从信录》、茅瑞徵《皇明象胥录》、方孔炤《全边略记》、瞿九思《万历武功录》、李逊之《崇祯朝纪事》、谈迁《国榷》、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

以上诸书内容丰富，体例不一，在清代同遭禁毁厄运。谢国桢先生对此等书之研究价值评价甚高，曾说，“如能别而出之，则明代对辽东史事之真像大略可见矣”^②。其中，对本课题研究较有参考价值者有：

张鼎《辽夷略》1卷。明末诸书于辽东蒙古及兀良哈三卫分布地、牧放及市赏地点等多混淆不明，而是书无不条分缕析，记述甚明。记建州女真各部及海西女真情况，也并非陈陈相因语。所记海西哈达、叶赫两部世系，可与清官修《满洲实录》诸书彼此参证。记清太祖努尔哈赤家世，也有参考价值。清皇室以爱新觉罗为姓，而明人记载则谓努尔哈赤父、祖姓佟。“佟”与“爱新觉罗”究竟是什么关系，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迄今未有定论。是书记努尔哈赤长男洪把秃里即洪巴图鲁褚英，贵英把秃里即古英巴图鲁代善、忙哈大即莽古尔泰、黄台住即皇太极、把卜台即巴布泰、阿卜台即阿巴泰、把卜海即巴布海，与清官修史书记载同。努尔哈赤杀长

^① 《清开国史料考》一，国立北平图书馆1931年本，第21页下。

^② 同上书，第22页上下。

子褚英及杀弟舒尔哈齐二案，均为清官修史书和《清史稿》所讳莫如深。是书明确记载两人系努尔哈赤所杀，可见所记多为信史。惟是书题名“辽夷”，而于努尔哈赤之先世未能言明，不无缺憾。

茗上愚公（茅瑞徵）《东夷考略》4卷。作者因任兵部职方郎中，熟知四方职责和边疆诸族情况。本书首篇《女直》，记秦汉以来女真部族历史沿革；次篇《海西》，记南北关王台、祝孔革部族之发展；第三篇《建州》，记王杲、阿台之事迹，迄努尔哈赤之兴，至万历末年而止。首有《辽东全图》、《开铁图》、《开原控带外夷图》、《沈阳图》、《广宁图》、《海运饷道图》，足资治史者参考。

作者记努尔哈赤为建州之支部，及并有诸部、蔑视明廷之事，海西哈达、叶赫两部兴废之迹，确切可靠。记明正统三年（1438）征建州董山之役，马文升之抚辽东，以及杨镐之四路丧师，无不绘声绘色，脉络详明。

管葛山人（彭孙贻）《山中闻见录》11卷。是书记辽东史事，上起明初，下迄明崇祯十七年（1644）吴三桂引清军入关。记明与后金（清朝）战事系统、详实。第一卷至六卷为建州；第十卷为西人志，第十一卷至十三卷为东人志。此处“西人”指蒙古，“东人”指女真，包括建州和海西诸部。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46卷。作者虽任事平庸，但勤于著述。是书系他任辽东经略期间，“广搜群议，衷以管窥”，“博采奏章”，“集诸邸抄”编就。纪事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取抚顺，下迄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清太宗皇太极改元崇德进攻锦州之前。载明神宗万历、光宗泰昌、熹宗天启三朝间辽东史事。叙事溯源详流，首《总略》，次编年及奏议。十余年之事，记载详实，保留了有关满族建国前后的若干珍贵史料。

瞿九思《万历武功录》14卷。《东三边》11卷，载有《王台列传》、《虎儿罕赤、猛骨孛罗、康古六、歹商、温姐列传》、《逞加奴、仰加奴列传》、《卜寨、那林孛罗列传》、《王兀堂、赵锁罗骨列传》、《奴儿哈赤列传》、《王杲列传》、《阿台、阿海、阿革、来力红列传》，也是有关明末女真酋长及其活动的基本史料。

《开原图说》的作者冯瑗，万历末年曾任辽东开原道，其以当时人记当时当地事，史料价值很高，特别是有关开原沿边防务及边外蒙古、海西女真诸部的资料，弥足珍贵。

它如海滨野史《建州私志》述女真诸部源流，方孔炤《全边略记》第十卷《辽东略》记明朝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对蒙古、女真等族的治理，程开祜《筹辽硕画》卷首《东夷奴儿哈赤考》述努尔哈赤事迹以及建州女真情形，都有参考价值。

满族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从毗邻各先进民族得到不同的益处，特别在早期，蒙古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蒙古文史籍除记载两个民族密切交往的历史外，还保留着有关满族早期历史的一些宝贵片断。大约成书于17世纪初叶的蒙古族重要史籍《蒙古黄金史纲》以及罗卜桑丹津著《蒙古黄金史》，是两部最重要的珍藏。

罗福成类次《女真译语》，贾敬颜、朱凤合辑《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金光平、金启琮撰《女真译语研究》，金启琮撰《女真文辞典》，在考证女真名物制度等方面也有参考价值。

清代满汉文献是可资利用的又一大宗史料。清朝官书往往抹杀早期历史实情，对与明朝、朝鲜的关系忌讳尤甚。清修《明史》对女真史实少有记述，或者语焉不详。乾隆年间官修《满洲源流考》，将满洲世系上溯先秦肃慎，但于明代女真活动反竭力遮掩，无此通病者则有《满文老档》。

《满文老档》指满族人关前用无圈点老满文书写的编年体官方史书，乾隆年间复用新满文重抄。原本残缺，今存天命前九年（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部分，是研究满族兴起史的第一手原始资料。1918年，满族学者金梁招聘人员翻译老档，1929年将部分译稿以《满洲老档秘录》名义刊布，其后又将部分译稿在《故宫周刊》连载，题称《汉译满洲老档拾零》。金梁译文只求达雅，信则不足，为后人所病，其实首事之功不可泯没。可惜，此后数十年间老档在国内几无人问津。

1939年，日本出版了藤冈胜二的《满文老档》日译本。50年代，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等组成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至1963年7册出齐，用罗马字母转写满文，逐一直译，下附日语译文，是日本学者整理《满文老档》的一项突出成绩。

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开始译注《满文老档》原本，即无圈点老满文原档，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此后以《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为名出版了2册，体例与《满文老档》日译本同，满汉对照，下附汉语译文。《老满文原档》所记有为《满文老档》不载者，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张葳《旧满洲档译注》将天聪元年（1627）至五年（1631）的老满文原

档译为汉文，是台湾学者整理满文古籍的又一成绩。

1990年，中华书局终于印行了由国内学者集体译注的《满文老档》，是国内满族史、清史学界的一桩大事。这部译著纠正了前人译本的一些缺失，反映了《老档》翻译的新水平。但由于未录满文原文，加之个别地方抄写有误，所以在依据满文审音勘同、考证名物等方面，日译本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整理翻译出版清初满文档案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198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是继《满文老档》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译著，无异于《满文老档》的补编。这样，关于满族建国初期的历史，便有了由满文档案和清朝实录并行的两套史料，两者可以互为参稽补充。另外，台湾学者李光涛、李学智自1959年以来先后编辑《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初集包括《沈阳旧档》38件，二集收录老满文档案4件，均为研究满族开国史的珍藏。

《满文老档》记事起自1607年，对于这之前的满族历史只有求诸《满洲实录》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前书体例为历朝正史所无，以满蒙汉三体对照行文，又附图绘77帧。是书虽最后成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前后，但文字主要取材满文老档，图绘则源于天聪九年（1635）完成的《太祖实录图》，故保留了比较古朴的面貌，堪称研究满族早期社会制度、族源世系、肇兴事迹的瑰宝。1938年，日人今西春秋出版了《满和对译满洲实录》，将满文转写为罗马字母，用日文逐词直译，下附汉文原文，书末《注释》对书中涉及的主要制度或史事逐条诠释，抉微阐幽，是一部集史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著作。近年，台湾学者陈捷先撰《满文清实录研究》（《满文档案丛考》第一集），对《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的沿革关系进行了穷原竟委的考辨。

清朝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确立“首崇满洲”原则，重视对本民族历史的研究整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旗通志》、《满洲源流考》等一批官修史籍应运而生。《八旗满洲氏族通谱》80卷，书成于乾隆九年（1744），满汉两种文本，据明清档案笔记家乘等写成，是探明满族早期血缘组织形态变迁与牛录固山制度发展的重要参考文献。1989年，辽沈书社据武英殿本影印，附有姓氏人名索引。《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1739）书成，专记八旗制度与八旗人物。其中，《旗分志》和传记部

分是考镜满族早期人物与牛录源流的重要凭依，历来为史家所重，今通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校勘本。神田信夫曾将《八旗通志初集》和《二集》中列传和人物志所收人物编为索引，1965年东洋文库满文老档研究会以《八旗通志列传索引》为名印行，是研究满族历史和八旗制度的重要工具书。此外，《清朝开国方略》、《清朝通志·氏族略》、《清史列传》等官修史书，也较有参考价值。

以上缕述了与本研究有关的重要典籍和整理情况。前人在文献整理校勘译注等方面付出的巨大劳动还远不止这些。对于文献的整理，奠定了研究的坚实基础，经过中外史家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在满族早期社会史这一传统领域，早已成果累累。

日本学者自20世纪初即着手满族史料的搜检，对满族早期历史的研究开拓早，用力深，成绩斐然。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稻叶岩吉撰《清朝全史》、《满洲发达史》，至今仍有学术参考价值。这一研究在三四十年代达到高潮，涌现出鸳渊一、和田清、户田茂喜、旗田巍、今西春秋、三田村泰助、中山八郎、园田一龟、安部健夫、周藤吉之等一批知名学者。以后，他们的研究大多结集出版，主要有：周藤吉之《清代满洲土地政策研究》（1944）、园田一龟《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1948）、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1955）、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的研究》（1965）、安部健夫《清朝史的研究》（1971）等。

50年代至今，日本的研究队伍仍具备很雄厚的实力，涌现出阿南惟敬、神田信夫、松村润、河内良弘、江岛寿雄、细谷良夫等以研究清前史和八旗制度史而著名的学者。

明代女真的部落组织，内部又包括血缘组织与地域组织，关系比较复杂。1935年，旗田巍发表《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依据15世纪中叶《朝鲜实录》有关图们江流域女真部落的调查报告，对建州女真吾都里（斡朵里）部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精细考证，认为其村落已非血缘集团，而且贫富差别相当明显，据此得出吾都里部氏族制度已经崩溃的结论，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成果。三田村泰助在先后发表的《满珠国成立过程的考察》（1936）、《明末清初的满洲氏族及其源流》（1960）、《穆昆塔坦制的研究》（1963）中贯彻了一个基本观点：由于女真的老氏族组织过于庞大，不能再履行各项社会职能，于是从哈拉分化出的穆昆逐渐取而代之，后者是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血缘组织，是决定女真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三田村泰

助祖述内藤湖南，持明代女真社会氏族制度说，故不免忽略氏族组织日呈瓦解的种种征兆。尽管如此，他的论著无疑构成对女真社会组织最为系统的考察，不少观点颇有见地。

噶栅（即村寨）是女真部落内的基本地域组织。旗田巍《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最先剖析噶栅的内部结构，他在《关于满洲八旗的成立过程的考察》（1940）中，进一步研究噶栅的规模，正确指出了噶栅规模狭小的特点。并且认为，“噶栅、乌克孙（以及穆昆）是满洲早先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1944年，《史渊》32期发表了江岛寿雄的《明末清初噶栅的各种形态》，依据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的记述，将建州女真的噶栅分为四种类型，但未就噶栅的性质和内部关系作较为详尽的说明。这种根据观察得到的相似性和差异，把噶栅组织加以分类的方法，有助于对不同类型噶栅的特征进行概括并彼此进行比较。此外，中山八郎《明末女直和八旗体制的素描》（1936）、今西春秋《满和对译满洲实录》（1938）等文，也曾就女真社会的血缘、地域组织问题各叙己见。

女真社会组织的细胞是家庭。日本学者不仅注意分析家庭中贫富分化现象，而且揭示了家庭制度的特点。内藤湖南曾在《史林》7卷1号发表的《清朝初期的继嗣问题》一文中指出：幼子继承制度是蒙古和满洲的传统，时在1922年。尔后，旗田巍《关于建州三卫的户口》（1940）提出：女真素有父子兄弟分居的习惯，男子成年后即依序离开父亲，另居一户，财产也分别占有。

女真部落管理机构主要由大小酋长组成，旗田巍《吾都里族的部落构成》认为，吾都里部酋长是强盛家族的代表。田中通彦在《十五世纪女真族社会和初期努尔哈赤政权的结构》一文中进一步说明，吾都里的村落内分为主体家族和从属性的依附家族，前者保持较明显的聚居，内部分化也更显著。在《明代女真族的社会构成》（载《木村正雄先生退官纪念东洋史论集》，1976）中他表示：女真酋长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质，对于部民既有强制和剥削役使的一面，又有依赖的一面，这种状况与部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阶层分化有关：大小酋长及其一族是奴隶的占有者，一般成员则缺少耕牛等必要的农业生产手段。

河内良弘在研究明代女真史方面成就卓著。代表作《建州女真的迁移问题》（1969）一文，对建州女真各部迁移的时间，在精心排比的基础上总结出其迁移规律，即几乎都在每年三四月进行，且迁移在多数场合与农